



周總理巧用大公報

方 凌

1969年11月6日，香港《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迹象》的報道，揭露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蓄意破壞中蘇邊界問題談判的行徑。這條只有400來字的消息，當時在國際上所引起的震動，被外電形容為「超過400噸TNT炸藥的威力」。可是外界並不知道這條消息出自哪位高手，具有怎樣的複雜背景，又怎麼會成為香港《大公報》的獨家新聞而引起國際上的密切關注。

不久前，《大公報》老社長、前全國人大常委費彝民先生的女兒、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費婁女士，在紀念老父誕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揭示出這一塵封了43年的絕密。原來這篇重要報道的作者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記者就此進行了追蹤採訪，從許多重要的史料中，梳理出當年複雜的時代背景和周總理為《大公報》撰寫這條消息的詳細經過，更加展示出周總理在處理複雜的國際問題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偉大氣魄與高超的外交藝術。

文革時蘇想趁亂而入

1969年，正是新中國跨入建國20周年的時候，但由於諸多複雜的因素，特別是當時正值「文革」在國內造成的全面動亂，及其對外交工作的干擾與破壞，使內憂、外患日益嚴重。正如原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龔惠平在回憶周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的文章中所敘述的那樣，在國內，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林彪集團趁機忙於搶班奪權，派性內戰搞得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國無寧日；從國際角度來看，則面臨來自兩個超級大國從南北兩個方面施加的壓力，我們既要在南邊援越抗美、對付美國的戰爭威脅，又不得不面對北方的壓力而加強防備。

而就在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安定的國內局面的時候，蘇聯竟在1969年3月在東北中蘇邊境上挑起武裝衝突，烏蘇里江珍寶島上傳來的槍炮聲，無情地向全世界宣告，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關係惡化到了戰爭的邊緣。

蘇欲動核武美不捧場

事實證明，蘇聯領導人忘乎所以，完全打錯了算盤，竟不顧自身的危機妄想在我國的「文革」動亂中乘虛而入，首先在烏蘇里江挑起邊界衝突，甚至就此向美國進行試探：「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

然而蘇聯領導人萬萬沒想到，美國駐蘇聯大使在蘇軍向珍寶島發動武裝挑釁後的1969年4月22日，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轉交了尼克松總統的一封信，並口頭說明，美國「無意看到蘇聯和中國發生衝突，也不想利用中蘇分歧」；同時告訴蘇聯領導人，從長遠來說，美國「希望實現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白宮歲月》中，對此經過作了詳實的記述與證明。

美國的這一回應，無異於給蘇聯領導人潑了一盆冷水，使他們比較清醒地看到，尼克松出任美國總統後，一再流露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向，而不得不把防止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打破蘇美戰略平衡，確定為蘇聯在外交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目標。

北京機場的非常會晤

1969年9月10日，周總理赴越南河內出席胡志明主席葬禮，同時參加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想就此同周總理進行會晤，但周總理認為此時此地不適合進行這種接觸，當即返回北京。於是柯西金在次日取道北京回莫斯科，在首都機場停留，謀求與周總理的會晤。

1969年9月11日，周總理在首都機場同柯西金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會晤。新華社在當晚發了一條只有100多字的公報式消息，稱「雙方進行了坦率的交談」，沒有透露任何具體內容。

據當時的我國駐蘇使館公使銜參贊龔惠平後來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那次不尋常的「坦率交談」，進行了3個半小時，「集中就雙邊關係中一些帶有緊迫性的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

針對蘇聯向美國試探「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周總理嚴肅地向柯西金指出，「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

與此同時，周總理再一次闡明我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即中蘇之間的爭論，不應妨礙兩國國家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不應為邊界問題而打仗；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談判求得公正合理的解決。周總理指出，當務之急是在談判解決問題之前，首先採取措施使雙方的武裝

編者按：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報創刊110周年報慶日。這不僅是大公人的盛大節日，也是所有關心、愛護和支持大公報的讀者和各界人士值得慶賀的一天。大公報110年的風雨歷程紀錄了當代中國的滄桑變化。為此，本報從即日起增闢專欄「大公報110周年」，刊登新老大公人的回憶文章，共訴百年大公情和對未來發展的美好期望。

◀由於消息不宜以官方媒體發布，周恩來在關鍵時刻想起了《大公報》

▶費彝民即場將400字的稿件速記起來，回港後默寫出來，親自核校小樣，直至看了版面大樣才安心休息



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卻一直沒有兌現。

至於珍寶島的歸屬根本就不成問題，歷史上就是我國領土，特別是在烏蘇里江的枯水季節和落潮的時候，可以明顯地看到，珍寶島乃是與我國大陸相連的一個半島。本應以珍寶島的北端和對面的蘇聯一側之間劃定中心線來分界，但蘇方卻硬要在烏蘇里江洪水氾濫、漫上地勢較低的我方堤岸後劃定中心線，硬把珍寶島劃入他們的一側；這當然是我方所絕對不能接受的。

然而談判席上的蘇方代表不但不正視歷史事實、不考慮中方的五點合情合理的建議，反而倒打一耙，說是我們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侵犯了他們的領土。

我方代表列舉的事實逐條駁斥蘇方的反証謬論，並質問蘇方代表：1、到底是誰侵略誰？2、到底是誰在奉行擴張主義政策？3、是我們歪曲了馬列主義，還是你們背叛了馬列主義？4、蘇聯政府是否仍準備以不平等條約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我方代表堅定地表示：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是不容歪曲的！

蘇方代表無言以對，便採取拖延的手法混日子。

西花廳裡的歷史時刻

與此同時，蘇方對外卻裝出一種「和解」的樣子，散布錯誤的信息，給人以談判似乎「相當順利」的印象，企圖掩人耳目打「中國牌」的伎倆來鞏固其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爭霸的地位。這顯然是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極為

在西花廳等候多時。他首先介紹了情況，要費公以「《大公報》廣州電」的電頭發一條消息，並徵求費公的意見：「你看該怎麼寫？」費公說：「請總理指示」。

「那好，我先說，請你記一下，然後咱們再研究。」周總理成竹在胸，把已經打好的腹稿一字一句地口述出來，一開頭就在新聞導語中很客觀地點出了引人注目的問題：「據本報記者最近從北京得到的印象，中蘇邊界談判並不像外界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樣順利。」

緊接着，周總理強調：「中國的立場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國方面堅持，為了使中蘇兩國邊境局勢能夠真正緩和下來，使邊界談判在不受任何威脅下進行，中蘇雙方必須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然後着手全面解決邊界問題。」

周總理指出：「據認為，如果蘇聯方面確有解決邊界問題的願望，對談判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不是從實力地位出發，表面上裝出和解的樣子，實際上是在拖延談判，利用中蘇談判的名義，追求另外的目的，那麼，雙方就沒有理由不能經過平等協商，就臨時措施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從而為全面解決邊界問題，締結新的邊界條約創造必要條件。」

「消息結尾，應該這樣寫」，周總理加重語氣說：「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根據本報記者了解到情況，還看不出談判有取得進展的跡象。」

費彝民立即將速記稿整理出來請周總理審定。周總理作了些修改後，十分謙虛地徵求費公的意見：「請你再看一下，這樣行不行？」費公表示沒有意見，剛要把電稿收起來，周總理又抽回稿子對費公說：「不行，為了安全起見，這個稿子不能讓你帶走；請你馬上熟悉一下，把它背下來，回去再默寫，明天就在《大公報》上發出來。」

記憶力驚人的費公，很快就將這400來字的電稿印入腦海，並當場準確無誤地背誦出來。周總理滿意地笑了，便叫工作人員端來一點點心。費公感動說：「多謝總理，不用了，我要爭取時間馬上趕回香港。」周總理深情地緊握費公的手，關切地說：「那就太辛苦你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周總理特派新中國第一代特級飛行員、曾為他駕駛10多年專機的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張瑞霖駕駛專機，送費公直飛廣州；廣東有關部門立即派專人護送費公安全出境。

費公回到報館，將稿子默寫出來，立即召集老總和有關編輯研究版面安排；他親自核校小樣，直看了版面大樣才回去休息。

次日——1969年11月6日，這條400來字的消息作為《大公報》的頭版頭條刊出後所引起的震動，被外電形容為「超過400噸TNT炸藥的威力」；各大通訊社紛紛轉發並發表評論，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得到世界公正輿論的一致好評與支持。

喜見中俄友誼譜新篇

43年過去了，滄海桑田，歲月如梭，溫故而知新，放眼未來，更加充滿希望。1991年蘇共宣布解散，蘇聯解體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有了新的發展。正如胡錦濤主席在莫斯科慶祝中俄建交6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題為《共創中俄關係美好未來》的講話中所指出，回顧過去60年，中俄關係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這60年，是兩國政治關係日益走向成熟的60年，是兩國務實合作成果日益豐富的60年，是兩國人民友誼不斷加深的60年，是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逐步推進的60年。中俄關係60年的發展歷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啟示：只有相互信任、誠誠相待，才能不斷深化兩國政治關係；只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才能在中俄合作中獲得最大收益，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只有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互為支撐，才能有效維護各自根本利益；只有求同存異、友好協商，才能保證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講話中也表示，60年標誌着成熟，標誌着兩國關係達到全新水平。現在是一個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發展前景的好機會。俄羅斯願意深化同中國在各領域的關係。

這些經驗的總結和偉大的成就，確實得來不易，值得我們像愛護眼睛那樣珍惜、護衛，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中俄友好合作和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取得豐碩的成果吧！

（本文作者為《大公報》前副總編輯）



◀本報1969年11月6日的頭版頭條引起國際上的密切關注

▼1969年9月，周恩來與柯西金於北京機場進行一次歷時三個多小時的會晤



不利的，必須即時揭發蘇方這種拖延談判的態度，以正視聽。但當時又不宜以中央機關報和國家通訊社等任何官方媒體發布消息，就在這關鍵時刻，周總理想起了香港的愛國報紙《大公報》，想起了一貫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久經考驗的《大公報》老社長、國際新聞界名人費彝民先生，於是緊急召見費公，委以重任。據國務院文件記載，周總理先後單獨接見或召見費彝民50餘次。此次乃是周總理對費公的一次非同尋常的歷史性召見，也是這兩位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老朋友在「文革」動亂中最難得的一次相聚。

當時香港與內地往來受到許多限制，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出入口岸氣氛緊張，「造反派」在北京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干擾與破壞不斷升級，各地「造反派」和「紅衛兵」爭相湧向深圳，甚至要衝過羅湖橋去「解放香港」，與港英當局派出的軍警，在深圳河兩岸對峙，邊界上氣氛十分緊張，特別是「造反派」可以任意查或扣留被他們認為「可疑」的出入境人士，使許多人不能正常入境。當時京港之間的民航班機也常因「造反」的干擾而不能正常起降，費公又是知名人物，當時的行蹤特別引人注意，所以只能冒險走單騎，秘密入境，取道廣州直飛北京。

費彝民抵京後直奔中南海，此刻，周總理已